



美国经济正在衰退

郑嘉

当下的全球金融货币市场依然以美国利率和美元价格为锚,而市场变动虽然从长期看是围绕经济基本面而波动的,但短期的波动可能远远超过了基本面能够解释的范围。美国经济基本面和美元的强弱走势,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货币市场。

目前围绕着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变化的话题是热点。很多中国分析师对美国经济的判断是积极乐观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就业率和平均薪酬的增长,而且似乎拥有“美国永远强大”的信念,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做出中立客观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更合理的观察视角是将美国劳动参与率纳入考量。据统计,2022年12月美国全部人口中“16到65岁之间的成年人数量约为2.648亿”,其中纳入就业和失业人口的劳动力数量约为1.65亿,两数相除得到的62.3%,就是劳动参与率。美国存在大量不去主动(指统计之前4周没有试图)找工作的人,其中有些是家庭主妇,还有大量被劳动力市场淘汰下来,没有再就业打算的人。他们仍属于劳动人口,但是除了一些消费和不被GDP统计

的工作,他们不会对社会再生产做出贡献。美国的失业率计算并不包括这部分人口。12月美国公布的失业率是3.5%,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数字,表明有意愿找工作的劳动人口中,有572.2万仍找不到工作,如果再加上那些不可能找到工作(彻底躺平)的人,将近1亿。只有六成劳动力在为GDP做贡献,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失业包袱。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目前看来,真正“躺平”的中国劳动者并不多,尤其是年轻人。前段时间,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20%左右。不过,我们的城镇失业率统计没有包括全部失业人口。中美差别是中国的劳动者对就业的需求更大。美国的通胀受到有限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需要给就业者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换言之,美国现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火爆现象,本质上并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造成的。我们从GDP和一些先行指标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在衰退。而且,美国经济界对2023年经济衰退的前景基本取得了共识。

对美国产生误判的另一个视角来自美元指数,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变化的比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是综合

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情况的指标。由路透社根据构成美元指数各成分货币的即时汇率每隔约15秒更新一次。以全球各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算量为基础,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出美元的整体强弱程度,并以100点为强弱分界线。目前美元指数是参考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进行加权计算,其中欧元占比超过57%,加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可以看到欧洲货币或经济基本面对美元、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弱有较大影响,对这个指数的影响程度接近八成。换句话说,美元指数是个相对指标,因此,美元指数前期的上涨主要推动力是因为欧洲经济基本面和预期走低,尤其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英国政坛变化带来的经济政策调整等,推动美元指数从2022年初的95,到9月底达到了最高峰114.79,现在逐步回落到104左右。

另一个推动美元指数上升的力量是美联储加息效应。美联储在2022年连续进行了7次大幅度加息,造成资金回流推升美元汇率,也造成了其他国家货币相对美元汇率走弱。其中人民币受到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走

低了9%以上,导致人民币汇率被动贬值到了7以上。同样,2023年美元指数走低也使得人民币被动升值,又重新回到了7以内。应该说,美元指数正在回归其长期波动范围,即90-100区间。在欧洲经济基本面不太可能很快转好的情况下,在美联储2月份加息之前,这个指数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平缓,但是向下的空间很小。美元指数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在100以上运行。

美国、中国和欧盟是支撑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它们在2023年可能会面临本次周期最困难的时期。疫情之后,企业需要休养生息,但是惯性下行很难避免。目前已有大量科技企业在裁员,这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国企裁员的消息,这是自从国企改革以后很少见的现象。中、美、欧都需要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继续加息并维持不引爆全球债务市场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只能尝试每次25个基点的小幅缓慢加息,这是一场压力测试,也许只能加到5%以上就停止。这个息率水平远不足以实现2%-3%的通胀目标。美国2023年最佳经济预期是滞胀;其次是不同程度的衰退;最

差是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导致美联储不得不转向宽松货币政策。欧盟最大的风险仍是债务和低速经济增长,另一个是俄乌冲突可能升级,战场扩大到北约国家。中国经济面临净出口压力、民营经济活力难以短期得到提振以及依靠自然增长的消费无以为继的困局,政府除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之外,至关重要是通过制度性改良提高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萧条和停滞在短期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个无法再依赖高投入和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维持增长的后工业化时代,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唯一出路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途径有两条,即经济的绿色化和数字化。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踏入数字经济,面临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挑战,可能远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更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可能更快、更迅猛。下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一定会到来,在此之前,通胀、通缩、萧条一如以往,都会次第出现,而且因周期重叠而力度更强。现有社会经济结构需要经历重大调整,应该做好准备,审慎应对旧的模式被破坏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

(作者系经济学者)



“卡在中间”的日本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韩和元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美国信息高速网计划的带动下,互联网产业飞跃发展。而在传统产业领域,则表现为中国开始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正是得益于这种变化,在中美的联合推动下,过去30多年里,全球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却是一个例外。其他国家长足发展的30多年,于日本而言却是停滞的30多年、失落的30多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随着日本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无法避免。可惜的是,面对大泡沫的破灭,日本政府只顾眼前利益,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顺势杀死僵尸企业、出清债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结果是固化了其原有的产业模式。

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是,日本根本无法享受到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中国加入战团,而使得日本国内产业逐渐趋于疲敝——受制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它们在中低端产品上,无法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展开竞争。同时,又由于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日本在高端产品方面,也开始变得无法与欧美国家,乃至与韩国、中国台湾展开有效的竞争了。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只顾眼前利益的宏观政策,令日本经济日趋僵尸化,进而尴尬地卡在了中间。而这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对于中国,无疑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近年来,世界经济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单表现在诸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飞跃发展,同样也表现在传统产业领域。随着中国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和以廉价劳动力为底色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出现。事实上,近年来,越南等东南亚

国家和印度等南亚国家,正在复制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即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进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

数据显示,越南如今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主要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的主要生产国之一。2022年,全球总需求下降,供应链断裂,出口生产商在进料和消费市场面临困难。在很多人担心全球经济放缓将对越南出口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时,越南的商品出口成交额仍比2021年大幅增长,越南货在国际市场的占比持续扩大。

在这方面,印度的表现也颇为不俗。印度人口即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于2060年后达到17亿的峰值。而且,印度人口相对年轻化,又会说英语,是国家劳动力的重要骨干。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印度的实体经济显著改善,数码基础设施特别是金融支付系统,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越美国。印度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外资,包括

在2021年初推出“制造奖励计划”(Production-Linked Incentives),在电信、电子、医疗设备等先进领域为国内外制造商提供经济奖励措施。

受此影响,2022年9月,苹果公司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5%到10%的新款智能手机iPhone 14。其最大代工富士康也将与印度矿业集团丹升塔(Vedanta Resources)合作,斥资200亿美元在印度建造半导体工厂。

得益于此,2022年上述国家的经济都表现得异常抢眼。据国证大数据搜集的亚洲主要经济体2022年GDP增长数据,或者各国12月份自己的统计机构和央行预估的数据,越南以8.02%的GDP增速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佳;其次是马来西亚,其GDP预估将增长7.6%;第三是印度,其GDP预估将增长7%。

正因为此,对于这种趋势,中国必须有所认识。必须认识到应对短期困难固然重要,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更

不能成为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一味只顾眼前利益,一遇到困难就习惯性地走回老路,而不是加快产业结构的成熟和升级,那么,中国所做的一切,很可能跟当年的日本一样——只是在固化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真可能会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是,中国将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这些新兴经济体加入战团,反而招致中国产业的疲敝。而近期美国对华的技术封锁,对华技术的“卡脖子”,也间接地表明,在高端产品领域,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产业不能顺利升级,未来很可能面临如今日本面临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中国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有效竞争;在高端产品方面,中国也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

孙勇

一提到“节制生育”或“计划生育”,中国人很容易想到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先生。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新人口论》重点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迫切性,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内含“节制生育”之意)。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批判,但是后来还是影响到中国最高决策层,成为制定计划生育国策的重要参考。

实际上,在《新人口论》发表之前,就有一位中国人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和农学家蒋梦麟先生。巧合的是,马寅初和蒋梦麟都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而且都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论留学资历,马寅初早几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是蒋梦麟的师兄(同校但不同专业);论当北大校长的资历,蒋梦麟主政北大在先,是马寅初的前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先生考证,早在1922年,蒋梦麟就介

绍美国提倡“生育制裁”的山格夫人到中国来访问,并在北京大学演讲。至少从那个时候起,蒋梦麟就已经对人口增长必须与社会经济增长同步有了相当深切的认识。而山格夫人“生育制裁”的思想影响蒋梦麟人口观念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949年,蒋梦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地区。此后,他在继续关心教育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台湾地区的农业、土地与人口问题上。伴随着国民党大量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迁入台湾、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以及婴儿潮的出现和死亡率的下降,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台湾地区的人口剧增,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3%,最高时甚至超过5%。蒋梦麟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对于台湾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提出“节制生育”问题。他指出,只有控制住人口盲目增长,农业复兴才能真正实现,才能真正化解台湾人口的压力。

在蒋梦麟的著作和言论中,最早提出人口问题的是1951年2月发表的《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村复会工作》和同年7月发表的《土地问题与人口》。在这两篇文章中,蒋梦麟援引中国历史上“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明确提出人口与生产

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数年,他又发表《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谈谈台湾的人地问题》等多篇文章,阐述自己对台湾人口问题的忧虑和对策。

1959年4月,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这是中国现代人口政策史上的一份经典文献,它标志着蒋梦麟节制生育思想体系的成熟。在此文中,蒋梦麟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在当高生育率下,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城市的人口;二是,台湾省每年新增人口消费一个石门水库当年(注:石门水库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水利工程,1954年动工,1964年竣工)所能增产的粮食。基于此,蒋梦麟大声疾呼:节制生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此文一经发表,就在台湾各界引发激烈论战。反对者中,有人认为蒋梦麟目光短浅,有人认为蒋梦麟违背了孙中山遗训,有人甚至把蒋梦麟比作黄巢、秦桧和汪精卫。

对于自己的节制生育主张遭遇的抨击、污蔑和威胁,蒋梦麟早有心理准备。他在台湾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制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制而闹下乱子,我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当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

一个人。”

在见仁见智、弹赞双方针锋相对的争鸣中,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1961年,台湾“人口研究中心”成立,并于1963年在台中市推行节制生育实验。1964年,台湾“卫生署”成立“家庭卫生委员会”,全面推行节制生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与中国大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的节制生育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通过舆论倡导、生殖服务、政策倾斜等柔性的方式来实施。

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与马寅初的节制生育观相比,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看到了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过快之间的矛盾,进而主张以节制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同之处在于,马寅初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并举,蒋梦麟则无此主张。

从现存的公开史料看,马寅初节制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1953年,马寅初提出了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的观点,建议国人生少优生,鼓励全国人民有计划地进行节制,并且主张超生罚款。他当时认为,每个家庭拥有两个

孩子是比较正常合适的(彼时中国大陆生四个以上孩子的夫妻比比皆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这标志着他计划生育思想体系的成熟。而蒋梦麟有文字可证的节制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在1951年到1957年之间,与马寅初计划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当。可以说,蒋梦麟和马寅初是海峡两岸人口学的双子星,两人共同成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

毋庸讳言,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思想,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70年前,蒋梦麟和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时,台湾地区和大陆尚带有浓厚的农耕社会的烙印,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和今天相比,还处在比较低的层次;思想界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也远远达不到今天的深度。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出现独身主义潮流和家庭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如今,信息时代的台湾地区和大陆,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新生儿人口不足,已成为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蒋梦麟和马寅初当年始料未及的。新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课题,呼唤着新一代的思想者,在超越蒋梦麟和马寅初的基础上,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和而不同】
如果中国的产业不能顺利升级,未来很可能面临如今日本面临的局面。

【口舌之勇】
如今,信息时代的台湾地区和中國大陸,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新生儿人口不足,已成为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蒋梦麟和马寅初当年始料未及的。